

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例分析

（徐康辉 法律硕士 2120191993）

一、案情简介

鸿顺公司多次被环境保护主管机关查获以私设暗管方式向连通京杭运河的苏北堤河排放生产废水，废水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污染物指标均超标。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曾两次对鸿顺公司予以行政处罚。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鸿顺公司将被污染损害的苏北堤河环境恢复原状，并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如鸿顺公司无法恢复原状，请求判令其以 2600 吨废水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26.91 万元为基准，以该基准的 3 倍至 5 倍承担赔偿责任。

二、当事人的请求与抗辩

（一）原告的诉请及理由

公益诉讼人的核心诉讼请求是：将被告污染损害的苏北堤河环境恢复原状，并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如被告无法恢复原状请求判令其以环境污染损害咨询意见所确定的人民币 26.91 万元为基准的三倍至五倍承担赔偿责任。

公益诉讼人上述诉请的理由如下：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65 条规定，被告应当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告认为被告具有远超 2600 吨的排放事实，故而建议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判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 responsibility 采治理成本的三至五倍。

3. 此处，这个三至五倍的法律依据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虽然司法解释规定了裁量权。但是其具体是如何确定的数额，内情没有详细说明。对此表示一定的疑虑，专家辅助人也没有在此发表意见。当然，法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了实地考察，应当有相关的依据或者评判。

（二）被告的抗辩及理由

被告虽愿意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但认为：（一）被告不应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由于被告周边企业较多，所有工业废水均排放至苏北堤河，环境治理工作需要多家企业共同完成，且经过环保设施改进，被告现在没有污水排放，苏北堤河应当已经达到Ⅴ类水质标准；（二）被告以前违法排放的废水污染物成分以有机物、木质物、纤维素为主，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极少，生态环境受到的损害较小，恢复较容易，公益诉讼人认为排放 2600 吨废水相应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数额为 26.91 万元，计算过高；（三）公益诉讼人要求被告以 26.91 万元为基数计算三至五倍赔偿，不能成立；（四）被告已在两次行政处罚中缴纳共计 15 万元罚款，该款项应当用于环境治理，应从赔偿数额中扣除。综上，被告愿意倡导环保、努力改善环境，支付相应赔偿数额，请求法院综合本案相关事实以及被告企业发展状况，合理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责任。

被告的主张存在如下问题：1. 被告辩称其周边企业数量比较多，所有工业废水均排放至苏北堤河。却不提供证据证明共同污染事实，以适当减轻自身责任。又表示“苏北堤河应当已经达到Ⅴ类水质标准”，却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而且二审也没有提交新证据，让人对此说法产生疑虑。2. 第三点反驳没有提供支撑证据或依据，即便是此后的辩称，也是主张福利企业等等内容，并不能作为支撑。

三、法院判决

（一）一审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鸿顺公司排放废水污染环境，应当承担环境污染责任。根据已查明的环境污染事实、鸿顺公司的主观过错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等因素，可酌情确定该公司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遂判决鸿顺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共计 105.82 万元。

（二）二审判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污染物排放点的环境质量已经达标不能作为鸿顺公司拒绝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理由，一审判决以 2.035 倍作为以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系数并无不当，以查明的鸿顺公司排放废水量的四倍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对法院判决的分析

1. 该案尝试根据被告违法排污的主观过错程度、排污行为的隐蔽性以及环境损害后果等因素，合理确定带有一定惩罚性质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加大污染企业违法成本，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企业违法排污。

2. 根据本案事实，在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时，不应该局限于排放 2600 吨污水这一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损害数额，还应适当考虑其它具有关联性的因素，予以合理确定。这一考虑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在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时，应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作为酌定因素。